

“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述评

丁又双

(上海师范大学 地域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要: 文章对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有关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中的焦点和各方观点进行综述,梳理“中日关系之辩”的脉络,呼吁对日关系需要客观理性的新思维,提出建立中国在道义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理想的对日关系。

关键词: 中日关系;对日关系新思维;历史问题;正常国家

论争的起因

2002年12月,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以游记见闻和史料回顾的方式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指出: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日本的崛起,是“亚洲的骄傲”;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不必大惊小怪”……并援引欧盟的例子,主张作为“亚洲的枢纽的中国与日本”,“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的“对日关系新思维”。^[1]此文发表之时,正值中日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全新调整的微妙时期,一时间,“对日关系新思维”成为中日两国间的热门话题。

2003年4月,《战略与管理》又推出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文章,从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的高度,对马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论

释。文章强调,营造良好的中日关系,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安全两难’”,谋求“中日接近”的“迂回战略”,且具体提出了搁置历史问题、扩大日本对华投资、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强化日中两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5点主张,并将这种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预期的政策改变,称为“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2]时殷弘的国际关系学者身份及其文章中明显的为政府的外交思路建言的姿态,很快引起社会各界反响,尤其在日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时氏本人也因此受到日本外务省等机构的邀请,一年中两度出访日本。

时隔四个月《战略与管理》又于2003年8月以专栏形式推出了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对于对日关系到底需不需要新思维的问题不但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总结了“对日新思维”的5条原则和10个特色,从专业角度指出中日经济合作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主要交汇点,是双边关系的长远、坚固、真

收稿日期:2004-07-08

作者简介:丁又双(1963-),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地域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政治经济与战略研究。

实的基础,提出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的“双管齐下”处理对日关系的新主张。^[3]为了详尽阐发自己的主张,冯氏连续刊发多篇文章,笔锋所向,几乎涉及了中日关系的所有问题。并且,把“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思路推而广之,提出了所谓“对亚新思维”和“新思维外交”的概念。冯的加入,使一些此前认为马、时二人“根本不懂日本”,其立论“过于幼稚”、“不值一驳”,故暂且作壁上观的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也奋然投入其中,论战开始升级。

论争的焦点

由于一些中日媒体和网络对马立诚、时殷弘文章的某些观点大肆炒作,使人们对对日关系新思维形成一种偏见,以为它就是主张“不要再提历史问题”。在中国国内对这种主张持强烈反感的人们似乎没有心思去辨别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不同“版本”,区分其主流意见与非主流意见,大有全盘否定对日关系新思维之势。现对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有关对日关系新思维论争中的焦点及各方观点和论述进行综述。

一、中国人是否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对马立诚、时殷弘两篇文章的动机和目的有较多肯定,并且认为马和时的文章确实给了中国的日本学界一些启发,两人提出的一些理念值得深思。马立诚和时殷弘的两篇文章从战略角度指出中日两国所存在的问题,笔锋犀利、针对性强,对扭转我国对日关系氛围有好处^[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认同发展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强调中国的对日政策应该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反对者认为马立诚等人所称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是讲不要再纠缠历史问题,不要过分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要给日本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而现在问题的核心不是中国要给日本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而是日本要给中国一个做正常国家的机会。新思维必须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如果新思维的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的新思维应该是日本人的新思维。^[5]“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最大缺陷就是脱

离当前日本的现实以及中日关系的实际,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随美国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对华的防范心理,低估了日本鹰派势力的能量,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基于这些低估之上而放弃一切原有对日政策,无条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求日本的回报,其结果只会造成战略被动,最终能否出现“中日接近”局面,十分令人怀疑。^[6]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7]

二、如何看待历史问题

马立诚认为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首先,从1946年到1956年这10年间,国际法庭判决了5000多名日本战犯。因此,日本的法律责任已经完成。其次,从1972年起至2002年止的30年里,日本政府已经21次正式向中国道歉、反省,承认“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日本时曾对日本天皇说过:“过去的就过去了,从今以后一切都要积极向前看。”这就是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意思。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他们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接受了日本的反省式道歉。^[8]时殷弘主张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强调搁置不等于遗弃,不等于放弃警觉,更不等于忘记过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8]冯昭奎呼吁“放下包袱”,不要让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发展双边关系的阻碍。“放下包袱”绝对不等于忘记历史,绝对不等于中国人不谈历史,更不等于中国人赞同日本人的历史观。所谓“放下包袱”是从外交战略和对日政策的纬度上讲的,就是说不能被民族感情束缚了手脚,不能因为“对日没有好感”而盲目地“仇日”、“反日”,不能使这种情绪成为我们制定对日政策的基调或者政策来源。^[9]

对此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人们列举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从未干脆、彻底地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无保留地对中国人民道歉、忏悔,更谈不上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所以责任毫无疑问地在日本方面。并指出历史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

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还不是来自长达70年的日本侵华史,而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7]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也不同意时殷弘所说的,先把历史问题撇在一边。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中国不去谈它,日本不去承认它,它也不会变形或消失。所以,问题不是中国人要日本道歉而日本人不愿意道歉的历史之争,而是包含着两国将来发展的愿望在里面。^[10]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目标是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11]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搁置”或“超越”历史认识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外交失败,同时也将标志着中国在某种意义上默认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为此付出的国家道德代价和外交代价的影响将是深远的。^[12]

三、如何看待变化中的日本

马立诚提出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不必大惊小怪。从历史看,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1]时殷弘建议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时殷弘认为日本的军事力量及其使命确实在扩大,而且确实包含着危险性。我们既要有警觉,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如果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

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

反对者认为,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当然有权谋求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尤其是大规模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的关注和警惕。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怎能不让人担忧?人们的担忧事出有因,合情合理,怎能说是大惊小怪?^[7]日本的政治、军事地位受到限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既定安排,不是日本可以随意突破的。军事方面,日本固然可以一意孤行地重新武装、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但那将使之在国际上完全失去合法性,是日本不愿看到的局面。这可以由日本近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小步推进而没有卤莽行事的事实得到佐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举足轻重;没有中国的首肯,日本不可能获得正常军事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在让日本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东亚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上,中国更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怎么能说中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在中国还握有影响甚至左右局势发展的权力的情况下单方面、无条件地主动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听任甚至帮助一个历史上劣迹斑斑而不知悔改的近邻东山再起,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态势和政治地位造成严重后果。在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上,中国没有理由拱手相让。^[13]把日本送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实就等于多了美国的一票而已。^[14]

也有学者提出,日本的右倾化是一种相对的提法,需要结合历史来说明。用日本国内的话来讲,右倾化就是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这是相对于战败的“特殊国家”而言。普通国家就是要恢复所有国家都具有的一切相应的权利,如交战权、军

队、参与集体自卫权等等，这是日本追求普通国家的三个要素。如果日本具备了这三个权利之后，那么相对于过去的左倾化和较长时间的平静（中立）来说，可以称之为国家走向的右倾化。现在看来，向“普通国家”转变将是日本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种发展方向。当然，关于日本在国家转向的过程中会否出现性质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作出基本判断的问题。比如，会否走向军国主义的问题，但这最终取决于日本国民。^[10]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第一，日本人民反对；第二，国际形势不允许；第三，中国强大；第四，美国不会同意。日本自卫队确实大有加强，但基本上是在防御范围内。动辄提军国主义复活论是不切合实际的。^[4]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不等于日本就是重新军国主义化。把日本国家修改宪法与重新武装等同起来，是简单化与情绪化的想法，也于事无补。^[5]

马立诚认为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战争、不承认大屠杀，要为战争翻案，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但是这些右翼分子在日本是少数。^[5]

反对者强调判定一个政治势力的大小，不能仅仅看他们有多少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有多大的影响，掌握多少资源和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走向。在当今的日本，政府和大财团基本处于右翼思想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右翼势力的影响力超越了任何其他政治派别。小泉连续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亲兼右翼团体军人遗族会会长，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许多日本政客以右翼言论拉取选票，都明白无误地印证了右翼势力和右倾思潮的强大。不是说，这一状况会必然地和立即地将日本带上侵略扩张的老路，但这是处理中日关系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作为日本的邻邦、作为曾经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我们必须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保持警惕。^[7]

四、中日接近的现实意义

时殷弘从他的战略集中原则出发，强调在对外战略上不要四面出击，要有重点。建议大力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2]马立诚指出在现阶段，

中国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其他问题都要服从这个核心任务。中国的底子薄，需要从美日等发达国家引入资金、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8]冯昭奎也认为我们对日关系的最高原则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而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摩擦不利于我们对外开放，不利于我们的工业、旅游业和商业的发展，有损于我们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有人说中日政治关系摩擦不断的现状对经贸关系没有影响，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9]

反对者认为日本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有利可图，不会为了历史问题舍弃利润。日本人对中国的投资，出于严格的经济算盘。要吸引外资，主要靠的是建设一个法治、开放、民主的社会。此乃国家富强之正路，而不是靠出卖灵魂，拿祖宗生命的尊严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来换得几个眼前利益。当国际上的叫花子，是要不来几个钱的。^[7]

五、中日接近会给中国的国际战略利益带来好处吗？

马立诚提出，在美中日三角中中国处于劣势，现在中国如果不对日本增进友好的话，将把主动权更多地交给美国。如果增进中日友好，可以提高中国在中日三角中的地位。^[1]时殷弘认为，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的或“自动”的副产品。^[2]

赞同者表示，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处理好以对美关系为核心的外交事务。这个对外政策目标决定了中日接近或对日本“外交革命”的必要性。但同时指出的是，中日接近不是为了对付或制约美国，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处理具有全局意义的中美关系，处理那些关系到中国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外交革命”，乃是以大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外交创新的一部分，是为开创一种有益于中国安全的国际大局而迈出的第一步。^[15]

反对者指出，时殷弘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能够增强中国对美国外交的筹码，是“天真地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因为“美日两国都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关系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这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

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倘若中国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不仅将出现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使日本身价陡增,坐收渔利,而且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16]考察战后的历史,日本没有在一件大事上和在美国在国际上翻过脸。……要想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之外发展中日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亲日派”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接近会给他们带来反美的筹码。殊不知,日本长期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紧要关头,美国会坚决要求日本站到自己一边,日本也绝不敢不顾利害,自行其是。^[14]

六、僵局应由何处打开?

冯昭奎认为对日关系需要新思维,新思维的最根本之点,就是强调处理对日关系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以感情代替政策。并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应坚持5条原则:第一,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第二,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核心,注重从政治上如何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第三,以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崇高使命;第四,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即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不念旧恶不算旧账,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第五,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3]冯昭奎呼吁,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全局,主张在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国家关系与地方关系、双边关系与多边关系、政府交流与政党交流、外交政策与国内教育等各个领域“双管齐下”。^[17]冯昭奎强调,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要双管齐下:首先,中国不能忘记历史,坚持与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言行做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扩大两国的友好交流,尤其是巩固和发展双方的经贸联系。中日两国国民增强交流,才能加深相互间的感情。日本政治就是政治家必须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两国国民之间增强了感情,日本的广大民众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歪曲历史,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18]

金熙德认为中国对日政策的继续积极改进,当为中日关系不断发展下的顺理成章之事,而不

是因为换了领导集体才做的事情。在目前,启动和推动中日战略对话和军事交流,创造良好的政治、安全关系氛围,对21世纪中日实现战略和解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金熙德还建议,中国的对日政策,要坚持和强化1999年以来的对日重视路线,积极主动地推动双边关系和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中日合作。每当发生“历史问题”,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中日之间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做法,使两国在充分认清相互分歧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相互利益部分,使分歧部分在整个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的分量日益减小。^[6]

冯昭奎一再重申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发展中日关系是两国相互作用的过程,是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事业。中国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也应克服各种心理和政治的障碍,同样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样需要日本以善相报,不要误读中方的诚意;只有当中日双方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达到“为善为伴”的境界。冯昭奎指出:中国对日开展“新思维外交”并非中国“一相情愿”,并非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日本”。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机遇,换句话说,未来20年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战略机遇期,而且对中日两国来说也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机遇期,是中日两国利用经贸合作推动各自的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如果日本领导人错误地判断形势,把“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误认为“军事发展的机遇期”,那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时代潮流和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因此,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克服其对外战略的贫困与缺陷。^[19]

结语:中日关系需要客观理性的新思维

综观上述围绕中日关系及我国对日政策之论争,可以看到:有些议论从历史经验出发,有些议论则以现实感觉为依据,在这些主张中,哪一种主张最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抽象答之则易,具体答之则难。加强对日工作,建立致力于包括中日两

国在内的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但具体到各个方面应如何做，就需要认真讨论了。

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冷和”状态，并且由于日本加速右倾化、军事化的趋势，存在着“冷和”也难以以为继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寻求破解僵局、预防危机的方法。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加快和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欲望上升，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和竞争日益显现。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增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也使两国关系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增大。

然而，不论你喜欢日本也好，讨厌日本也好，都得承认日本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都颇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也许永远都有新问题、新课题存在。在中国国内，要批判过去日本侵略战争既理所当然又很得人心，但是，应该清楚地知道中日关系不可能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建立在“对历史问题高度一致”基础上的健康关系。作为一种理智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不要相互树敌，不要将对方越来越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中日关系需要客观理性的新思维，要建立中国在道义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理想的对日关系，在坚守自身道德原则，增强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以灵活开放、积极务实的态度和日本展开对话，寻求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国际关系中一个千古不变的铁律就是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没有实力的道义只会被看作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在国际关系中是否应该妥协和让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妥协和让步，这是国际关系中的艺术，需要根据彼此的实力对比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来做出判断。

半个世纪来，日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的再定义，以及当前受到国内普遍支持的小泉改革，在其对外意义上，都是为了日本变成“正常国家”。不管日本是否解决了与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未来日本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这是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事，也是影响未来亚太局势演变的重要因素。中国应以平常心看待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日本在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得到了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情况下，不管战败国条款是否存在，都可以作为一个

“普通国家”有资格有条件去和其他的国家竞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中国不宜公开支持日本的这种建立在对美盲从和缺乏历史记忆前提下的政治主张。

日本政治文化中历来就有崇拜强者的习惯，很多日本人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只是败给了美国而非中国，他们对战后美国对日本表现出的所谓“强者的宽宏大量”至今仍心存感激与佩服，所以心甘情愿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综合实力不及日本的国家。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人口约十倍于日本、国土约百倍于日本的中国，GDP则仍然只有日本的约四分之一。在政治、军事实力方面，日本也并不比中国差，何况还有日美联盟作为其实力的后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主动宽容日本究竟能否得到日本方面的善意回应，值得怀疑。笔者赞同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带有全局性的“双管齐下”处理对日关系的新主张，并将此界定为客观、理性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对于历史问题该争论的要争论，该呵斥的就呵斥，但不让历史问题影响正常的外交政策和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的中日交往中，每当出现重大挫折，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这种处理中日关系的做法虽然有利于稳定中日关系，但也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地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然后通过事后无关痛痒的回应达到政府无法达到的直接目的。日本人的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上表现得尤为娴熟。面对日本有组织的挑衅活动，日本人将责任归结到“少数人”的身上，并以此来应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如果中国放松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日本通过事实上的控制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这种策略充分地利用了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优势，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挑战中国人的极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开展政府的、非政府的、民间的三个层面的外交，积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建立民间救济渠道，依靠国际规则，努力捍卫中国国家的利益、公民的利益。

据日本的《中文导报》报道，日方已从中方对

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第4次参拜靖国神社及随后的日本政界为其擦屁股的对华“解释”外交的应对中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越到高层,话题越宽泛,越不涉及具体问题。让分管实务的负责人把具体问题谈清、谈透,高层领导人则从大处、高处着眼,少谈甚至不谈具体问题,避免双方在细节上结下“死结”,留下充分的回旋和讨论余地,同时也使双方在其它方面的交往不至于受到具体问题的牵涉和影响——他们把这种“分层次对应”的外交艺术称为“中国外交新手段”。近年来中国的对日外交策略中独具一格的“非政府外交渠道”也正引起日本方面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被命名为“新手段”的对日灵活外交正在影响和催生客观、理性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参考文献:

- [1] 马立诚.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J]. 战略与管理, 2002, (6).
- [2] 时殷弘. 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J]. 战略与管理, 2003, (2).
- [3] 冯昭奎. 论对日关系新思维[J]. 战略与管理, 2003, (4).
- [4] 凌星光. 战略对头, 战术欠妥——评马立诚和时殷弘的两篇文章[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9).
- [5] 朱萍. 中日关系新局如何破题[J]. 新闻周刊, 2004, (2).
- [6] 孙亚菲. 对日需不需要“新思维”[N]. 南方周末, 2003-06-12.
- [7] 林治波. “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J/OL]. 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 [8] 孙叔林、马力诚、时殷弘、鲁世巍. 中日交往要有新思维[J]. 时事报告, 2003, (7).
- [9] 冯昭奎. 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J]. 战略与管理, 2003, (6).
- [10] 陆忠伟. 中日关系: 理解与推进[J]. 现代国际关系, 2003, (9).
- [11] 吴广义. 解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2).
- [12] 王持明. 中日关系“窄幅震荡”是“常态”[J]. 世界知识, 2004, (4).
- [13] 张睿社.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 ——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2).
- [14] 薛涌.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国民——论亲日外交[J/OL]. 士柏咨询网, <http://www.pen123.net.cn>.
- [15] 周桂银. 理解对日“外交革命”[J]. 战略与管理, 2003, (3).
- [16] 林治波. “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J/OL]. 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 [17] 冯昭奎. 对日关系的艰难求索[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5).
- [18] 冯昭奎. 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J]. 战略与管理, 2003, (5).
- [19] 冯昭奎. 中日冷政治[J]. 了望, 2004, (3~4).
- [20] 林治波. 对当前中日关系若干问题的看法[J]. 战略与管理, 2004, (2).
- [21] 庞中英. 中国面对的几个日本问题[J/OL]. 神州战略网, <http://www.dt.bay.com>.

Comments on the Debate of A New Mentality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DING Youshuang

(Region Institut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central problems raised in the debate on a new mentality expected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well as of other different opinions and comments on the issue. The debate has lasted to this day since it start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2002. The paper approaches the issue of “the debate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clear and logical way. And it appeals for a new objective and rational mentality to be expected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inally, it proposes that we build up ideal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morality and reality.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 new mentalit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istorical problems that remain unsolved, a normal nation

(责任编辑: 苏建军)